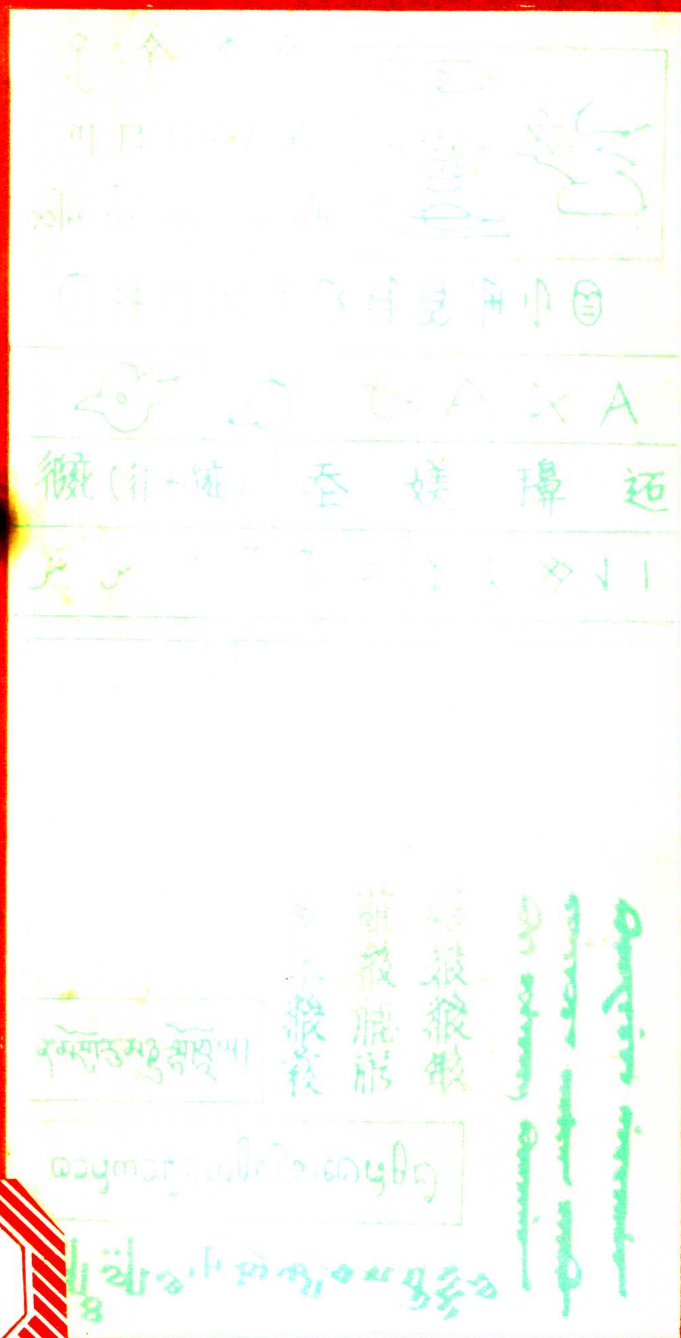


中國的文字

聶鴻音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的文字

聂鸿音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的文字

甄鸿音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县冠中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75,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742

ISBN 7-107-10166-8

G·1039 定价 1.60元

目 录

引言 你认识中国字吗?	1
文字的诞生和成长	4
你会写汉语吗?	4
文字的诞生	6
文字的童年	12
文字成长道路之一——词符	20
文字成长道路之二——音符	28
文字的发展方向	36
文字体系和文化类型	43
语言、文字和文化	43
汉文化和汉文体系	45
西域文化和突厥—粟特文体系	56
印度文化和印度文体系	65
阿拉伯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体系	74
西欧文化和拉丁文体系	77
古文字的发现和解读	82
古文字是怎样发现的?	82

引言 你认识中国字吗？

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字是辅助和扩大语言交际作用的重要工具，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不管录音机和电话机多么普及，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文字的地位。人们要记录自己的思想或者和远方的朋友互通信息，都要靠文字的帮助。既然文字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那么还会有哪一个中国的读者不认识中国字呢？——真是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然而，你可曾想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凡是说“我认识中国字”的读者，大约都是把“中国字”和“汉字”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其实，汉字尽管是最常用的“中国字”，但它仅仅是“中国字”的一部分。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字”，指的是中国境内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的文字。

幅员辽阔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多个民族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的文字种类很多，除去解放后创制的布依文、苗文、哈尼文、佤文、黎文、纳西文等一大批拉丁式新文字以外，还有二十多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如藏族的藏文，彝族的彝文，纳西族的东巴文、哥巴文，傣族的傣文，蒙古族的蒙文、八思巴文，满族的满文，锡伯族的锡伯文，白族的白文，哈萨克族

和维吾尔族的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古党项族的西夏文，契丹族的契丹文，女真族的女真文，等等；如果再加上朝鲜族使用的朝鲜文，俄罗斯族使用的斯拉夫文，总计有四十种左右。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文字学家敢于宣称全都认识它们呢！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主要是借助于丰富多采的古代文献，而“识字”则是阅读古文献的关键一步。早在公元100年，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就开始编写他的名著《说文解字》，奠定了中国文字学的基础。一千多年来，中国的文字学不断在发展中完善自己；到了清代，终于以一个巨人的姿态在诸多学科中大放异彩。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于汉字，这一方面是和历代封建王朝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有关，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考古学尚未开展起来，致使大量少数民族文献在地下长眠。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渗入中国，一批外国“探险队”相继到我国境内活动，发掘出了大量各民族的古代文献，其中还有一些尚不为人知的“死文字”。在他们的启发之下，我国也开始注意收集和挖掘这份自己民族的宝贵遗产，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建国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和各级人民政府合作，又抢救出一批濒临灭绝的珍贵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字学的资料宝库，开拓了文字学家的视野，从而使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了青春。

现在的中国文字学已不再是中国学者的专门学问，它已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掌握着不少中

国文字的原始文献，都有一批造诣颇深的科学家在终日伏案苦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形势喜人而又催人，我国的文字学正酝酿着一场革命。文字学家只有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接触大量的新材料，研究大量的新课题，创立一套文字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才能站到这股世界潮流的前列。不知读者是否意识到，这副重担也许将会落在你的肩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那么，这本书愿做你步入中国文字学殿堂的初阶。

这里准备向读者介绍一些必要的文字学常识，介绍中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特点和研究现状。当然，正如前面所讲过的那样，目前还没有人懂得全部的中国文字，所以这本小书也是参考了国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的，这里首先应代表读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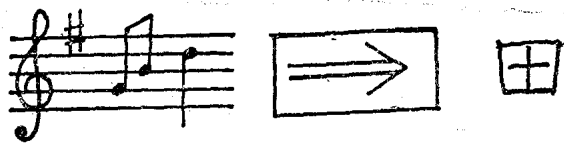
文字的诞生和成长

你会写汉语吗？

会说汉语的人都不会写汉语，这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大家写下的都是记录汉语的汉字，而不是汉语本身。我们在初学一种外国语的时候，比如英语，都要做大量的笔译练习，外语教师总是要求学生“把这几个句子译成汉语”，或者“把那几个句子译成英语”。这类话听起来似乎很好懂，可是你是否想到，其中的“汉语”和“英语”属于用词不当？如果说成“把这几个句子译成汉文”，或“把那几个句子译成英文”，只改动一个字，就显得精确多了。可见“语”和“文”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

“语言”和“文字”都是一种符号体系，但语言作用于听觉而文字作用于视觉。换句话说，语言是无形的，文字是有形的，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无形的东西不能写下来，写下来就变成了有形的，所以我们都不会写汉语。

既然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看得见”，那人们不禁要问：所有“看得见”的符号都是文字吗？当然不是。我们来看图一：



图一 乐谱、路标和文字

图一的三个符号都“看得见”，也就是说，都有形。但是谁都知道，只有最后的一个“田”才是文字。那么，“田”和其他两个符号的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用“音”和“义”两条标准来衡量。乐谱上的符号是代表音的，例如这里的三个音可以唱作“so、si、re”(572)，但它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们看不出它的意思是“往右走”还是“田地”。路标上的箭头是代表意义的，行人在路上看到这个符号，马上就明白该朝什么方向前进，可是它却不代表读音，我们不知道它应该念 wǎng yòu zǒu (往右走) 还是 xiàng xī xíng shǐ (向西行驶)。只有最后一个“田”才能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它的读音是 tián，意思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很清楚，乐谱有音而无义，路标有义而无音，所以它们都不是文字。真正的文字应该是既有音又有义的，或者说，文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它在很多地方还具有语言所不能取代的作用。我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基本存在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总是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语言的传播。生活中常遇到这样的事情，甲告诉乙一句话，乙又把话传给丙，丙再传给丁……，传来传去，这句话的内容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不传闲话当然是个好习惯，可是，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话不被别人乱传呢？办法很简单——把它写下来。甲写一个纸条子交

给乙，乙又交给丙，丙再交给丁……，无论传多少个人，甲的原意也不会有丝毫变化。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告诉远方的朋友，除了打电话，最好的办法还是写信，假使只托人带个口信，精确度一般就差得多了。另外，生活中有不少事需要记录下来，保存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而这些事一旦说完，它马上也就消失了。尽管我们可以把这些事储存在记忆里，但人的记忆力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要想一字不差地记上好几年，实在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及时地把这些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就不存在遗忘的问题了。

由此可知，文字比语言更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记录和传播文明信息，人类几千年知识的积累都离不开文字的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其科学文化必然落后。所以说，文字的产生和应用是人类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文字是怎样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呢？

文字的诞生

我们的祖先在集体劳动中常常遇到一些事情需要记下来，例如公共财产的数目，部落间订立的条约等等。当初人们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用文字，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叫做“结绳”的记事方法。汉文古籍中屡次提到“上古结绳而治”，但其具体方法已经不得而知了。后人猜想，所谓“结绳”不过是在一根绳子上挽几个疙瘩。外出狩猎的时候，打到一只野兽就相应地在绳子上挽一个疙瘩；一次狩猎回来，数一数绳子上一共有多少个疙瘩，就知道总共猎获了多少野兽。据说古秘鲁人

的结绳比较发达，他们是在一根主绳上系上各种不同颜色的小绳，用来表示不同的事情，例如红绳表示战争，黄绳表示金子，绿绳表示农作物，白绳表示银子，等等。也许古代的汉人也经过了类似的阶段吧！

不难想象，结绳的手段无论多么高超，也只能唤起人们对某件事情的回忆，而不可能把这件事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所以，这种用实物记事的原始手段同文字的产生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真正能称做“文字之母”的应是图画。

据汉文典籍记载，古人创制文字是受了鸟兽足迹的启发。狩猎曾是古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当时的人群中不乏技艺高超的猎手。我们知道，一个熟练的猎手在森林中寻找猎物时，都要靠地上的鸟兽足迹来为自己引路。这些足迹在猎手心目中实际起了某种符号的作用——熊的脚印可以代表“熊”这个概念，羊的脚印可以代表“羊”这个概念，等等。逐渐地，人们自然地想到可以把这些脚印描摹下来记事；推而广之，大量有形的东西都可以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例如太阳，月亮，牛，羊，树木，等等。图画在最初必然比较复杂，笔划繁多，画法也不一致，后来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要想使传达的信息尽量地具体和准确，就应该把原来的图画尽量地简化和统一，用经过简化的统一的符号来代表语言中的词。领悟到这一点之后，文字就开始逐渐脱离了绘画的母体，独立地为人类交际服务了。

发明文字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在童年时代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伟大创造力，他们总是把一切重要的发明都看成是天神或圣人的赐予。例如，汉人传说自己

的文字是上古时代一个叫苍颉的史官创制的，彝人则传说自己的文字是唐代一个叫阿呵的首长创制的。这样的话当然不能令人相信。我们知道，在没有见过文字的前提下，任何一个人的头脑都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悟出“文字”这个概念，这就好象一个祖祖辈辈都没见过大海的民族永远也不会发明潜水艇一样。退一步讲，即使真有某个超人能凭空设计出一套文字方案，他也很难把这个文字方案在根本不知文字为何物的人群中推广。因此，最初的文字只能是人类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劳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换句话说，文字是劳动人民长时期集体智慧的结晶。

最初的文字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所有的文字都是这样产生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种文字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人独立创制，并通过王朝的行政力量推广的。例如公元七世纪中叶，通米桑布扎创制了藏文，由吐蕃法王松赞干布颁行；十世纪初，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了契丹文，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颁行；十一世纪初，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文，由大夏帝李元昊颁行；约百年后，完颜希尹又创制了女真文，由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颁行；十三世纪中叶，八思巴创制了八思巴式蒙文，由元世祖忽必烈颁行；十六世纪末，额尔德尼和噶盖又创制了满文，由清太祖努尔哈赤颁行，等等。这都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历史，是有案可查的、实实在在的历史。

关于回鹘式蒙古文的创立还有一段小故事。传说蒙古人本来没有文字，如果需要记什么事情，他们就在一根三、四寸长的小木条上刻上几个刀痕，如刻十刀代表十匹马等等。公

元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了乃蛮国，俘获了掌管印章的国师塔塔统阿。据《元史》记载，这个塔塔统阿本是维吾尔人，天性聪慧，精通回鹘语文，深得乃蛮可汗的信任。亡国之后，他本想带着可汗的印章逃走，可是没能逃出成吉思汗的手心。成吉思汗不愧是个贤明的君主，他看出塔塔统阿是个德才兼备的人物，就破例把他留在身边为自己设计和掌管印章。后来，成吉思汗忽然从印章上受到启发，就让他试着用回鹘字母来拼写蒙古语，而他居然写得不错。于是成吉思汗让他当了王宫中的老师，任务是教王子们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言。这样一来，回鹘式蒙文很快就在国内流传开了。

由某个人设计的文字与最初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文字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前者一定有某种现成的文字体系可资参照。如创制藏文参照了古印度的梵文，创制契丹文和西夏文参照了汉文，创制女真文参照了汉文和契丹文，创制八思巴式蒙文参照了藏文，创制回鹘式蒙文参照了回鹘文，创制满文参照了蒙古文，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现成的文字作基础，新的文字概念是不可能突然在某个人头脑中产生的。

为一种本来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照搬一种比较发达的外族文字。我们的祖先就曾这样做过。例如汉代刘向的《说苑》一书中记载，春秋时代的楚令尹鄂君子晰乘船在河中游玩，划船的越人唱了下面这样一首古怪的歌谣：

滥兮扑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傺。州焉乎秦胥胥，缓予乎昭潼秦踰渗。惝随河湖。

鄂君子晰听了之后茫然不解，只好请了一个翻译把它译

成汉语，这才知道歌词是一首优美的好诗：

今夕何夕兮？蹇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首诗习惯上称做“越人歌”。据语言学家最近研究，这位划船的越人很可能是壮族的先民，因为诗中除了“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以外，其他各句若用壮语读出，大致都与鄂君子晰最初听到的那首怪歌吻合。古代不少民族没有文字，于是就搬过一些现成的汉字来记录本族语中的音节。类似的情况在《后汉书》里也出现过一例。

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及“李贤注”记载，后汉明帝永平年间，白狼王曾献给大汉朝廷三章颂诗，也是用汉字来记的少数民族语言。下面是原诗的第一章，原题为“远夷乐德”：

提官隗构，魏冒踰槽。罔译刘脾，旁莫支留。微衣随旅，知唐桑艾。邪毗緼繡，推潭仆远。拓拒苏使，局后仍离。倭让龙洞，莫支度由。阳雒僧鳞，莫稚角存。

这首诗由一个叫田恭的大臣译成了汉文：

大汉是治，与天意合。夷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繒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伸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

这首“白狼王歌”所用的“白狼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我们目前还不不清楚，一般猜测它是彝语或纳西语的前身。

除了照搬汉文的以外，我们也发现有少数民族照搬藏文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例如伦敦联邦关系部图书馆收藏有一件藏文写卷，原出自我国敦煌千佛洞。1948年，英国的托马斯

仔细研究了这件写卷,发现它记录的并不是藏语,而是一种位于汉藏民族交界处的未知的语言。托马斯称之为“南语”,认为它很可能是古代羌语的一个分支。“南”人没有采用汉文而采用了藏文,自然是这个民族受藏文化影响较大的反映。

照搬一种外族文字来记录本民族语言固然省事,但却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好办法。因为两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很难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一种文字在记录一种语言时可能很合适,但换一种语言就不一定能胜任了,比如英语的[wəʃɪŋtʰən]这个地名用拉丁字母 *Washington* 来记录是比较准确的,但换用汉字记作“华盛顿”[xuəʃəŋtun],同样是三个音节,其准确性就差多了。

显然,直接借用一种外族文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这并不能算是“创制”了文字。如果真的打算创制一种文字,一般都要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作一些加工,或者增减一些字,或者索性利用外族文字的原则重新设计新的字形。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是藏文和八思巴文的创制。

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大臣通米桑布扎奉法王松赞干布之命到天竺(古印度)学习佛法。他在攻读佛经的同时,还从婆罗门大师里津那里学习了多种古印度文字,又从大班智达拉日僧格那里学习了声明(语法)学;学成之后返回吐蕃,就开始遵照松赞干布的旨意创制藏文。他首先把梵语和藏语的语音系统进行了对比,然后决定从梵文的三十四个辅音字母中去掉十一个藏语里没有的音,另外增加了七字母代表梵文所没有的藏语语音,最后又适当改变了梵文字母的写法,从而制定了三十个藏文字母。这套藏文字母很好地适应了藏语的

特点,所以很快就在吐蕃地区流传开来,逐渐成了一种十分发达的中国文字。到了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国师八思巴又借鉴了通米桑布扎的成功经验,开始参照藏文为蒙古语设计文字。他也没有完全照搬藏文,而是根据蒙古语的实际情况作了增补,初步制定出四十一个字母,同时也稍微改变了一下某些藏文的写法。图二是梵文、藏文和八思巴字母表中的 ka 母,虽然字形不同,但其中的相承关系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梵文)



(藏文)



(八思巴字)

图二 梵文、藏文和八思巴字的 ka 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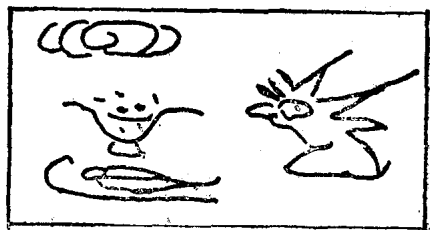
以上我们知道,产生文字有两条可能的途径——从图画逐渐演变和一次性创制。现在我们如果要问:这两条途径中的哪一条最有可能代表了原始的文字形态呢?每一个读者都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不错,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可是,原始的文字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文字的童年

一提到文字的童年,我国的读者恐怕都会想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吧?是的,甲骨文确实是年代最古的中国文字。然而,文字和人毕竟不一样,年代最古的并不一定就代表了最原始的面貌。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最初的文字是从图画发展来的,那么就不难想到,最古的文字应该是最接近图画的,或者说,

是刚刚脱离了图画母体的文字。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还有两种文字代表了比甲骨文更为原始的文字形态，可以说是反映了文字的真正的童年。

本世纪初，几位学者来到云南考察，意外地在纳西族居住的丽江地区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书籍，书中都是大量类似图画



图三 东巴文《白蝙蝠取经记》第44节

都是图画似的象形字，每个单字一般都代表纳西语的一个实词。这种文字非常原始，写法不够固定，同一个字常常有几种不

大相同的写法，致使巫师们读出的经文也不完全一样。不过大致说来，每个东巴字都有相对稳定的读音，这就构成了它和绘画的本质区别。图三是东巴文经书《白蝙蝠取经记》的一节。

这一节的左下角画的是水在山谷里流，读作 $l\partial\ l\partial\ dz\partial$ ，意思是“山谷里有水”；左上角画的是个胞胎，下面画的是一个碗，里面盛着脏水，两个字合起来读作 $t\partial^{\wedge}\ dz\partial$ ，意思是“污水”；右边画的是一个羊头，读作 se ，本来表示“崖羊”，这里借用来代表动作的“完成”。另外，经师在读经的时候，还要在适